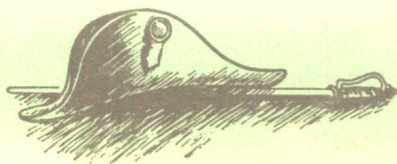


拿破仑时代

上卷

〔法〕乔治·勒费弗尔著



商务印书馆

拿破仑时代

上 卷

〔法〕乔治·勒费弗尔著

河北师大外语系《拿破仑时代》翻译组译

端木正校

商 务 印 书 馆

1978年·北京

PEUPLES ET CIVILISATIONS XIV

NAPOLÉON

Par

Georges Lefebvre

Sixième Edition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Paris

1969

拿破仑时代

(上、下卷)

〔法〕乔治·勒费弗尔著

上卷·河北师大外语系《拿破仑时代》翻译组译

下卷·中山大学《拿破仑时代》翻译组译

端木正校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1/32 22⁵/₈印张 530千字

1978年10月第1版 1978年10月上海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11017·414 定价：2.50元

出版说明

本书是法国出版的题为《民族与文明》丛书的第十四卷。《民族与文明》是一部以欧洲和法国为重点的世界通史丛书，其中第十三卷《法国革命》^①和第十四卷《拿破仑时代》是乔治·勒费弗尔(Georges Lefebvre)撰写的。

乔治·勒费弗尔(1874—1959年)是法国著名的资产阶级历史学家，他从1914年发表第一部关于法国革命的著作到逝世前的四十五年里，一直从事法国革命史的教学与研究。1932年他继阿尔贝·马迪厄当选为“罗伯斯庇尔学会”会长和《法国革命年鉴》杂志主编，1935年起在巴黎大学主讲法国革命史。勒费弗尔保持了马迪厄学派注重社会和经济问题和推崇雅各宾民主专政的史学传统。他对革命前和革命期间的农民问题有较深入的研究，著有《法国革命期间诺尔郡的农民》、《恐怖时期的农民问题》等著作。关于法国革命的各个阶段，也都有专著论述。

本书是勒费弗尔于三十年代初执教斯特拉斯堡大学时，边讲课边撰写的，1935年完稿出版，到1953年已出了第四版。他的学生阿尔贝·索布尔在他逝世后负责整理他的遗著，1965年印行了由索布尔增订的第五版，1969年值拿破仑诞生二百周年之际，又印了第六版。索布尔对原著正文增订不多，但对勒费弗尔开列的参考书目则有所补充。这部书从出版后四十多年来，一直被西方资产阶级史学界公认为关于这一时期历史的一部优秀著作，并译

^① 《法国革命》一书最初系由勒费弗尔与居约、萨尼亚克合著，1930年初版；1951年由勒费弗尔全部改写。从这一版起改由他单独署名出版，1968年印行了第六版。

成多种文字。

本书不是一部拿破仑个人的传记，而是一部从拿破仑·波拿巴取得政权到他失败这段历史时期（1799—1815年）的法国和欧洲的历史。作者不仅把拿破仑时期同法国大革命时期从纵的方面衔接起来，使读者看清这两个阶段的连续性，而且把拿破仑统治时期的法国放到世界史范围内加以考察，从横的方面同欧洲各国历史联系起来。勒费弗尔一方面肯定了拿破仑顺应历史潮流，在巩固资产阶级政治制度和推进资本主义发展方面的贡献，另一方面也指出了他与封建势力的妥协和对雅各宾派的压制。在论述拿破仑通过征战把法国大革命的成果推广到欧洲其他地区所起的积极影响时，作者也揭露了拿破仑建立欧洲甚至世界帝国的野心和他所进行的战争的扩张侵略和掠夺的性质。此外，本书对当时欧洲列强的争霸以及英国和俄国的扩张侵略政策也作了具体的分析和揭露。总的说来，作者对这段法国和欧洲历史的叙述比较全面细致，条理清晰，对当时法国国内外各种矛盾也有所剖析，对拿破仑本人性格的刻画，有些地方也是比较深刻的，有助于我们了解法国和欧洲的这段历史。

应该指出，勒费弗尔对于拿破仑的对外政策的分析是缺乏说服力的。尽管他也谈论法国同欧洲之间的社会、政治、思想的冲突，法英、法俄争夺霸权的矛盾，以及欧洲民族主义反对法国统治的斗争，但是他没有紧紧抓住这些对立和冲突，进行阶级分析，揭示它们的转化规律，却认为拿破仑所追求的各种目的是互相矛盾的，因此断言：“没有任何合乎理性的解释可以把拿破仑的对外政策统一起来，……归根结蒂，还是要回到他的‘野心’上来。”（161页）但是这种“野心”又是从哪里来的呢？作者无可奈何地又归之于拿破仑的“性格”：“勇于冒险，迷于幻梦，任性冲动而不能自制”（同上），并概括地说：“拿破仑其人主要地就是他的气质。”（68页）

我们并不否认一个英雄人物的性格对于历史发展所起的某种作用。马克思曾经指出：“发展的加速和延缓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这些‘偶然性’的，其中也包括一开始就站在运动最前面的那些人物的性格这样一种‘偶然情况’。”^①但是任何性格都脱离不了一个人的思想倾向，特别是政治思想，而政治思想也不可能是抽象的，超阶级的。拿破仑的称霸野心正是法国大资产阶级本性的集中表现。

勒费弗尔无法解释为什么拿破仑既满足了法国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同时又进行“没完没了的战争”，以致损害了法国的民族利益。于是他又用“此人的性格较之他的天赋更不能安于和平与节制”(64页)来说明。实际上，在当时欧洲的政治制度下，一国之所得就是他国之所失。而且每次战争总是以拿破仑作为胜利者强迫战败者接受自己的条件而告终，从而播下了新战争的种子。归根结蒂拿破仑“野心”的根源不应从他的“浪漫主义”性格中去寻找，而应该从他作为大资产阶级代表的特殊政治观点和政治利益中去寻找。正如马克思指出：“拿破仑已经了解到现代国家的真正本质；他已经懂得，资产阶级社会的无阻碍的发展、私人利益的自由运动等等是这种国家的基础。他决定承认和保护这一基础。”^②这就是说，拿破仑建立帝国这个政治上层建筑的真正目的，就是为了维护法国大资产阶级的利益，保护资本主义经济基础。但是，拿破仑的称霸野心又是无止境的，他把建立霸权看作最高的政治利益。“只要资产阶级社会的最重要的物质利益(即商业和工业)一和他拿破仑的政治利益发生冲突，他也同样毫不珍惜它们。”^③正是拿破仑的不断战争论导致了法国的失败和帝国的崩溃。

① 《马克思致路·库格曼》，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4卷，第393页。

② 马克思：《神圣家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卷，第157页。

③ 同上，第158页。

作者还多次嘲弄“历史决定论”，宁愿强调偶然因素，例如他认为“拯救英国的不是自由主义经济的‘自然规律’，而是俄国的冬天。”（144页）他也未能摆脱欧洲中心论的偏见，在涉及亚洲和中国的部分，他只把远东地区看成殖民和传教的对象，而抹煞了这个地区的独立发展。他还主观地推断，如果不是由于欧洲的战争，远东早已被西方列强侵占了，“欧洲的内哄拯救了远东达四分之一世纪有余。”（299页）这些错误论点希望读者加以注意和批判。

原著书名为《拿破仑》，为了更符合本书的内容，中译本书名增加“时代”二字。本书原为一卷本，中译本分上下卷出版。上卷由河北师范大学外语系《拿破仑时代》翻译组根据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69年出版的英译本译出；下卷由中山大学《拿破仑时代》翻译组根据法文原著第六版译出。全书由中山大学历史系世界史教研室端木正同志根据法文原著参照英译本进行了校订。中译本除增加一些译注外，还选用了英译本的少量注释。

原著开列大量的参考书目，分别附在各编、各章节的页下。我们只择其要者选录，把参考书目集中附在上下卷正文后面。

原著索引全部译出，索引中的页码和译文旁边的页码均为原书页码。

目 录

绪言	(3)
----------	-------

第一编 革命的遗产

第一章 旧制度与革命的冲突	(5)
一、社会的和政治的冲突	(6)
二、思想的冲突	(11)
三、民族的觉醒	(24)
第二章 战争的后果与和平的条件	(29)
一、大陆各国	(29)
二、英国的战争努力	(33)
三、法国及其盟国	(38)
四、封锁与中立国	(44)
五、英国资本主义的力量与困难。欧洲向全世界的扩张	(49)
六、和平的条件	(61)
第三章 拿破仑·波拿巴登台	(64)
一、法国的独裁统治	(64)
二、拿破仑·波拿巴	(67)

第二编 内安法国 外和欧洲(1799—1802年)

第一章 法国独裁体制的组成	(75)
一、临时执政府与共和八年宪法	(75)
二、波拿巴权力的组成与扩大	(81)
三、仓猝上阵的 1800 年战役	(95)
第二章 欧洲和平的实现	(98)
一、1800 年战役与吕内维尔和约	(99)
二、武装中立联盟与英国的危机	(107)

三、亚眠和约(1802年3月25日)	(112)
四、附庸各国的改革	(117)
第三章 波拿巴就任终身执政	(123)
一、共和九年的危机	(123)
二、教务专约	(134)
三、清洗保民院和就任终身执政	(141)
四、波拿巴的社会政策	(149)

第三编

提尔西特条约前帝国的对外征服(1802—1807年)

第一章 法国和英国：战端重启(1802—1805年)	(162)
一、波拿巴的经济政策与亚眠和约的撕毁	(162)
二、法兰西帝国的建立(1804年)	(176)
三、入侵英国的计划。特拉发加海战(1805年)	(183)
四、封锁	(191)
五、第三次反法同盟的起源	(195)
第二章 拿破仑的军队	(211)
一、征募与晋级	(211)
二、战争准备	(220)
三、战争指挥	(224)
第三章 大帝国的创立(1805—1807年)	(228)
一、1805年的财政危机	(228)
二、1805年战役	(233)
三、大帝国	(238)
四、与普鲁士决裂(1806年)	(246)
五、耶拿战役与奥尔施泰特战役。冬季战役(1806—1807年)	(252)
六、夏季战役与提尔西特条约(1807年)	(260)
上卷参考书目(提要)	(271)

绪 言

当拿破仑·波拿巴取得法国政权的时候，法国大革命和欧洲已交战七年有余；除了短暂的间歇外，战争要一直延续到1815年。在这场战争中，雾月十八日本身并不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一般认为以亚眠和约带来的和平期间为界，把这场战争划分为两个时期，也许会更为合乎逻辑。但若论及法国国内历史时，则雾月政变无疑地使个人专权得以恢复，而就这一点来说，拿破仑时期和法国革命时期是迥然不同的。但是，这种不同并不能掩盖联系这两个时期的深刻的一致性。正是法国大革命使波拿巴能有如此非凡的命运；他之所以能把自己强加于共和制的法国，是因为只要旧制度的党徒还在勾结外国力图复辟，就有一种内在的需要注定这个国家要实行专政统治；波拿巴和救国委员会^①在统治方法上存在有许多共同的特征，这些共同点比人们通常所愿承认的要多得多。他之所以能保持法国人领袖的地位，正是因为他尊重了制宪议会的社会立法成果；他的军事胜利保证了这些成果能够保持下去，并且使这些成果能够在法国永远根深蒂固。不仅如此，他的军事胜利还保证了把这些成果推广到欧洲各地，其迅速和功效，是宣传而尤其是自发传播所无从比拟的；如果他不曾把现代国家和现代社会的基本原则移植到他所控制过的各国，那么他以雷霆万钧之势所

^① 救国委员会旧译“公安委员会”，1793年4月6日国民公会选举九人组成，权位在其它委员会和政府各部之上，7月27日罗伯斯庇尔加入后，救国委员会成为雅各宾专政的领导机构。热月反动后权力削弱，1795年10月27日解散。本书谈到救国委员会时，均指它在1793年7月至1794年7月发挥专政作用的时期。——译者

进行的许多征战是不会留下任何东西的。他曾致力于创建新的皇统和新的贵族阶层,但都枉费心机;在他同时代的人看来,他依然是法国大革命的战士,而他也正是作为这样一个人物而载入欧洲文明史册的。

然而,从他成为法国的主宰时起,他自然地就占据了世界历史²的中心地位,以致尽管他的统治与法国革命这一悲剧之间贯穿着深刻的一致性,我们对以他的上台为界标的传统分期方法,仍然不能置之不顾;本书采用的就是这种分期方法。

本书不是一本拿破仑的传记,这点几乎已无庸赘述。正如这套通史其它各卷一样,本书不仅力图阐明法国人和拿破仑所征服过的各族人民共同生活的主要线索,而且力图阐明他所未能压制的各种独立力量所起的作用,以及他的权威所不及的各国的特征。英国和美国保持了它们的自由传统;资本主义继续在发展,不断壮大的资产阶级在准备夺取政权;宗教生活照样进行,拿破仑未能改变它的进程;他正在奠定基础的世界帝国已遭到各民族的反抗;尤其是在德意志,浪漫主义抚育了思想、认识和行动的新方式;拉丁美洲已在争取独立;这场欧洲大斗争的影响也不免一直波及到远东,虽然这种影响不是正面的,因为如果欧洲不是被这场内部斗争牵制住兵力的话,远东遭受欧洲的入侵就会早得多。透过拿破仑的天才所竭力造成的表面上的整齐划一,十九世纪变化多端的轮廓已经端倪可察。这个时期虽然为时短暂,但在这段期间里,在拿破仑面前似乎一切都黯然失色,左右历史进程的正是此人。因此本书以他的名字命名也就不足为奇了。

第一编 革命的遗产

3

第一章 旧制度与革命的冲突

十年的演进，而尤其是战争，深刻地改变了法国革命的进程。欧洲的面貌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法国领土向“自然疆界”的扩张显然打破了欧洲的均势。波拿巴所接受的遗产对他的政策有重大影响。阿尔贝·索雷尔^①认为波拿巴是他的命运的产物而不是他的命运的创造者；即使我们不同意这个论点，明确他所接受的遗产的一些特征还是适当的。

在这些特征中，最深刻的是法国革命从一开始就与欧洲之间的冲突。首先是社会冲突：特权阶级和受第三等级的其余阶层支持的资产阶级之间的冲突；其次是政治冲突：因为君主专制象特权一样受到了责难，此外，把贵族置于自己保护之下的帝王们，冒着和贵族同归于尽的危险。最后，还有宗教冲突，这种冲突是由于人们一般把法国革命理解为笛卡尔理性主义的产物而发生的，因为笛卡尔的无情批判摧毁了神秘和传统，人们认为这是构成旧制度的基础。各大国争夺霸权的斗争使上述各种冲突模糊起来，但却没有把这些冲突从当代人的意识中消除。这些冲突顽强地支配了拿破仑时代的历史。

^① 索雷尔(1842—1906年)，法国史学家，他的主要著作是八卷本《欧洲与法国革命》(1885—1904年出版)。——译者

一、社会的和政治的冲突

热月9日以后，法国革命的退潮已经很明显了。共和三年（1795年）宪法使资产阶级掌握了政权，他们虽然真诚地拥护新秩序，但却反对民主，他们不能把民主和雅各宾主义的经验加以区别。他们同斯塔埃尔夫人和空论家们一道，设想了一种寡头政治，它比英国的寡头政治更加现代化，但在本质上相类似；它要在富人的利益和“贤达”的智慧之间搞平衡。同时，资产阶级逐渐着手摧毁山岳党人的成果，甚至对制宪会议员的成就也不放过。他们废除了家庭法庭和仲裁程序，恢复了债务监禁和公证人费。共和二年遗产继承法的“追溯既往”的特征消失了，私生子的权利受到了猛烈打击。国有产业^①的出售，除对富人外，不再对任何人有利；共和七年，把那些被抵押的国有产业，无代价地给予了持有这些产业的人。村社公地的分配中止了；政府又力图把农民从1789年以来就自由使用的森林中驱逐出去。

但是这一切对于欧洲贵族来说，究竟有什么意义呢？尽管法国革命是为了争取资产阶级理想的实现，可是它仍旧是一场争取公民平等的革命。它的军队所到之处如比利时、来因地区、荷兰、瑞士，法国革命都摧毁了旧制度；教皇成了囚徒；奥伦治亲王、来因的选侯们和瑞士的贵族们都逃跑了。只有苏沃洛夫的胜利夺回了意大利，恢复了那些正统王侯的地位。颠覆性的宣传秘密地渗入了法国的邻邦，到处都在议论法国农民的解放以及无套裤汉胜利的消息。作家和新闻记者所作的努力，其效果比不上这些不脛而走的传闻；他们几乎都由于恐怖时代的过激行动而感到幻灭，或者

^① 字面意思是国家的财产，实际指法国革命时期国家从僧侣、贵族和其他人手里没收的财产。——英译者

被迫沉默了。希望和法国人一致行动的人到处都能找到，例如在南部德意志就有。甚至在普鲁士，拒服劳役和抗交封建赋税的也越来越多。谣传国王将废除这些苛捐杂税；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在即位时就收到了大批请愿书。在大洋的彼岸，纳里尼奥翻译了《人权宣言》；在美国，华盛顿及其随从怀疑杰佛逊和共和党人^①已被平等狂毒害了。

各处的贵族，甚至在辉格党的各大家族中，都吓得惊慌失措而聚集在国王的周围；各国的政府都加紧了控制。除了屈服于保罗一世的残暴专制下的俄国之外，奥国是首屈一指的，因为在那里，科洛雷多从此成了实行愚民政策的警察国家的化身，而梅特涅后来又被认为是始作俑者。在普鲁士，直到弗里德里希-威廉二世死前企图实行同样制度的沃尔纳险些被解职。在耶拿，费希特因⁶为宣传无神论而被控告，遭到了魏玛公爵的抛弃，并在1799年被迫放弃了教授职位。在英国，1794年以后，人身保护法停止执行，“煽动性的”社团和出版物也遭到了禁止。1799年，皮特强迫印刷商表明他们的忠顺，把非法组织的成员流放七年。在美国，联邦党人利用和督政府断绝关系而通过了针对法国民主主义者的“移民法案”，还通过了针对社团和报纸的危害治安取缔条例。在拉丁美洲，已经有人为自由事业献出了生命。“雅各宾派”所激起的恐怖，虽然并非全无根据，但却是被人夸张了。那些少有的赞美法国的人，象康德、费希特和在着手批判伯尔尼的贵族和符腾堡的寡头政治的年青的黑格尔，都非常谨慎地规定自己只向往合法的与和平的进步。没有一个国家自发地效仿法国；传播法国革命原则的，就是法国的军队。

^① 美国资产阶级政党之一，于1791年由杰佛逊领导建立，1794年改名“民主共和党”，是1828年建立的民主党的前身。现在共和党的前身是汉密尔顿领导的联邦党。——译者

虽然反动势力很猖狂，但不能说它们谴责了所有的改革。开明专制已经表明：某些改革是可以同君主专制政体和贵族社会相调和的。旧制度的各国政府承认法国制宪议会的成就并非一无可取，因而羡慕法国行政上的统一和它对财政特权的废止。英国的例子进一步向欧洲大陆上的农业国表明了圈地的优越和农奴制的落后。然而，只有在德意志，尤其是在巴伐利亚和普鲁士才进行了改革，这种改革把西方影响和本国传统结合起来。

德意志的启蒙运动虽然在学者中间失去了威望，但已经教育了资产阶级和政府官员。在巴伐利亚新掌权的蒙特热拉伯爵就是启蒙运动的信徒之一。在柏林，奥国的大使尖刻地说过，普鲁士的官僚谴责法国的敌人想“把理性的统治从地球上清除掉”，而普鲁士的伟大正应是归因于理性的统治。普鲁士的高级文官形成了社团，事实上采用互荐的方法吸收成员，保持了强烈的团体精神。他们很不高兴地注视着国王不断扩大“内阁”权力，以至一切都由国王和他的“秘密顾问”来决定；国王及其“顾问”对西里西亚和波兰7的一些省份的亲自治理，曾在弗里德里希-威廉二世统治时期招致了灾难性的后果。这些大官愿意把国王置于法治之下；1794年完成了弗里德里希法典起草工作的威廉·卡莫，就在法典中写入了关于个人自由、法官的终身任职以及宗教宽容等条文。他们同时也认识到：弗里德里希的国家实行的是农奴制，各省都珍惜自己的特殊制度，彼此为关税壁垒所分隔，都认为自己是一个自治的“民族”，因而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国家。最后，象波罗的海沿岸各国一样，普鲁士二十几年来已经变成大量出口粮食和纺织品的国家；开明人士注意到，萨克森的农学家阿尔贝·塔埃开始把英国的农耕方法介绍到丹麦的范例。他们对亚当·斯密的经济自由主义同样感到兴趣，这种学说在汉堡由比施讲授，在维也纳由瓦特罗特讲授，而在科尼希斯贝格以克里斯蒂安·克劳斯的讲授最为著名。

他对这个君主国的两位杰出的治理者舍恩和施勒特尔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是，最倾向于接受新思想的人都是普鲁士从德意志西部或国外招来的客卿：弗兰科尼亚的卡尔·阿尔滕施泰因，汉诺威的卡尔·冯·哈登堡——他治理安斯巴赫和拜罗伊特，从丹麦来的施特吕恩塞，尤其最重要的是来因帝国骑士的后裔施泰因，他在1804年出任大臣之前治理过克累弗和马尔克，这两个省从来没有采用过“普鲁士的制度”。

这还不是一切。和某些历史记载相反，施泰因和某些政治家仔细地考察了法国的实例，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如果让国民在法律、赋税和行政管理等问题上有一些发言权，政府就能增加力量和威望。然而，因为他们只把贵族和富有的资产阶级看作国民，所以他们就把注意力首先转向英国。在他们看来，在皮特的领导下，英国似乎已经把王室特权和宪法准则、党派竞争和维持秩序与政府稳定、贵族优势和资产阶级野心、贵族利益和全国利益等等都协调起来。勋爵们的“私囊选区”、“腐朽选区”^①保证了皮特在议会里获得多数，因而皮特也就迁就他们，但他并不同意他们的偏见。在他提名晋封的九十五名贵族中，有很多“新人”，他们是银行和商业的巨头，他们使贵族恢复了生气，并帮助贵族保持富裕生活和活动能力。由于伯克的缘故，这种平衡和智慧的奇迹使得许多法国革命的敌人归附英国，尤其是象马莱·迪庞和德·伊韦尔努瓦那些资产阶级和新教徒出身的人。甚至在法国亡命者中间也有赞美英国的人。在德意志，亲英派在汉撒城市和汉诺威数以倍增是很自然的，汉诺威的格廷根大学完全受他们的支配。雷贝格和布兰德斯给施泰因介绍了英国的思想，而施泰因运用它充实自己的政治思想。我们能在威廉·冯·洪堡的个人主义教义中找到这种思想的

^① “私囊选区”指由一人或一家控制的议员选区。“腐朽选区”指具有同等选举权但居民比其他选区少得多的衰落选区。——译者

痕迹,因为他主张国家只掌握警察和军权,而象在英国一样把其它各项管理职责都交给公民的自发组织;在洪堡的思想中,这就意味着使几乎全部社会生活置于贵族的保护之下。

特权阶级中大多数人象憎恨“雅各宾派”一样地憎恨这些改革家;面对着特权阶级的抗议,君主们动摇或退缩了。皮特本人就是一个例子。他虽然没有摒弃早年的计划,但却把它推迟到后来再实行。在奥国,约瑟夫二世的土地改革被利奥波德二世中止了,后者的继承人弗兰茨二世在 1798 年终于保留了封建义务和劳役。在里沃尼亚省^①, 保罗一世满足于使省议会通过某些和缓农奴制的措施;在多瑙河各公国,他的特派专员吉谢廖夫也没有更多的作为。在普鲁士,容克地主已经迫使弗里德里希-威廉二世修改弗里德里希法典。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则很快地放弃了他在 1798 年考虑过的废止豁免赋税等财政特权的改革计划。的确,他在自己广大的领地上坚决地继续解放农民,并改革农业经济,但他不敢把这些改革扩展到领主们的领地上去。普鲁士的贵族仍然垄断着高官显职。1800 年,在六、七千名官员中只有六百九十五名出身平民。施泰因自己只在财政方面实行了一些技术性的改革;他甚至没有能够废除国内的关卡。

就这样,法国以外的改革家几乎和“雅各宾派”一样无能为力。只是拿破仑的统治,或者说,是他的军队的猛烈冲击,才使旧世界得到更新。因此法国一直成为欧洲帝王们和贵族的眼中钉。那不勒斯的玛丽亚-卡罗莉娜写道:“我不同情,而且一辈子也不会同情法国人;我将永远把他们看成是杀害我的妹妹和王族的凶手^②,是一

① 里沃尼亚省在波罗的海沿岸,原以里加为省会,该省现分划入爱沙尼亚与拉脱维亚。——译者

② 玛丽亚-卡罗莉娜是上断头台的路易十六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的亲姐姐。——译者